

“我研究发展经济学的目的，就是想推动国家发展，所以积极参与各类政策性讨论和实践活动，这就是王阳明说的‘知行合一’‘知者行之始，行者知之成’。我提出新结构经济学，也必须在‘知成一体’‘知行合一’的基础之上。”

昨天下午，由宁波市人民政府、宁波市政协主办，宁波市社科院、宁波诺丁汉大学承办，国研经济研究院东海分院、宁波发展战略研究会执行承办、东南商报等单位协办的2017宁波发展论坛，在市行政会议中心举行。论坛现场座无虚席，其重要原因是重量级嘉宾来了。

他，就是著名经济学家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、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林毅夫教授。林毅夫教授作了一场《十九大后中国经济发展与宁波机遇》主题报告会，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。

宏观环境的“三不变”与“三变”

报告开始，林毅夫教授从国际视野分析目前的宏观经济发展环境。并运用他创立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，分析宁波在建设“名城、名都”过程中的发展机遇，并给出建议。他说，十九大后，中国走进新时代，有三个不变与三个变化。

第一个不变，中国的改革永远在路上。从1978年到2016年，我国年均经济增长速度达到9.6%，贸易增速达到14.8%，增速之快，快速增长时间跨度之大冠绝人类经济史。原因何在呢？因为我国改革不是简单照搬西方，而是根据国情来进行顶层设计。我国已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，上层建筑必须随着经济发展、经济基础的提升，作出相适应的调整与改革。这样，经济发展才能不断前进。

第二个不变，我国经济增长潜力巨大的基本态势没有变。2008年时，我国人均GDP只是美国的21%，这个比例相当于1951年日本与美国、1967年新加坡与美国的差距。从2008年到2016年，中国实际增长率平均是8.3%。他说，“原因是‘后来者优势’，也就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通过发明新技术、新产业来提高生产劳动率，而发展中国家则可以直接引进目前最先进的技术、产业来迅速缩小差距。我判断，中国在未来十年，仍将保持经济高速增长，还有8%的潜力可继续挖掘。”

第三个不变，中美关系合作共赢仍然是主基调。他说，因为中美仍然具有较强的互补性，在全球化分工的环境下相互依存，中国的发展本质上对美国有利，因此两国关系的基本面不会变。他说，“中美关系可以用一句唐诗来形容，在经济地位、政治地位、国际影响交叉变化的过程中，那些矛盾是不能避免的，但只要我们保持自己的定力，继续发展我们的经济，我相信是‘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’。”

而三个变化是：第一，中国老百姓的需要将发生变化从而导致供给侧产生变化；第二，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疲软使中国在外环境面临的挑战增加；第三，国际治理体系将从二战后美欧主导逐渐向中国倾斜。



接受本报记者(右)采访。

林毅夫 指路宁波经济发展 新机遇

坦言自己是王阳明“粉丝”，把“知行合一”融入新结构经济学研究



步入会场。记者 杨辉 摄

为宁波产业发展指路

林毅夫教授引用新结构经济学，将宁波的产业分成追赶型、领先型、转进型、弯道超车型与战略型五类。

追赶型产业，比如石化、机械制造、汽车零部件等，在发达国家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与利润。“宁波也有，但因缺乏技术含量，赢利能力较弱。”他建议通过并购获取技术、品牌和销售渠道，或者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获得制造技术。宁波的均胜、华翔等汽配企业，正是这样做的。

领先型产业，指的是外国由于生产成本提高而退出的产业，如白色家电领域的格力、海尔、包括宁波的奥克斯，无论是产能还是品牌都已经超过了国外同行。但这类行业的利润率持续下降，企业自身不愿意在产品研发与基础技术迭代环节投入太多，政府应该适时介入，帮助企业进行再发展。

转进型产业，比如纺织业、小家电制造、造纸业等。这类产业过去我国在劳动力成本上有优势，出口很多，但现

在这优势被新兴发展中国家替代。政府可帮助企业“走出去”，在要素资源成本较低的国家建立“宁波产业园”。这样，不仅可转化产能，提高盈利空间，还可避开许多国家对中国的贸易壁垒。这些企业通过并购获取技术、品牌和销售渠道，或者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获得制造技术。此外，政府也应该适时介入，通过引导基金等，帮助企业产品在研发与基础技术迭代环节进行再发展。

弯道超车型产业，林毅夫说，这类产业产品转化周期短，人才导向性强，十分契合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的思路。“中国有巨大的市场，有完善的制造业配套能力，加之近几年教育提升所带来的人才资源，我们在这个领域可以快速实现弯道超车。”

战略型产业，宁波可以发展集成电路等军工、国防战略型新兴产业，但初期研发投入大，回报周期长，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。

“我是王阳明的‘粉丝’”

在论坛现场，林毅夫教授对王阳明思想推崇溢于言表，多次引用王阳明思想“知行合一”“知成一体”来作为自己经济理论的哲学指导，并坦言自己是王阳明的忠实“粉丝”，一下子拉近了他与宁波人的距离。

“知行合一，知成一体，认识到了就应该去做。我为何在1979年从台湾游到大陆来？为何1987年放弃美国工作机会回到中国？因为有一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。”林毅夫的一番解释，全场报以雷鸣般掌声。

他表示，现在社会科学，认识世界、改造世界是两张皮。来自于发达国家的理论由

于实际情况的不同，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。因此，发展中国家社会理论的知和行要统一起来，需要发展中国家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创新。

“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宁波，在领航全国经济发展的同时，应该在社会理论创新方面有所作为，以便更好地认识世界、改造世界。希望宁波在社会科学理论方面能够领先于全国。”林毅夫说。

林毅夫还透露，今后，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将把宁波作为重要调研基地，和宁波市社科院密切合作，挖理论创新的金矿。

将宁波经验推广全国

关于人才、技术引进与产业化，林毅夫表示，“宁波经验非常先进。”去年，林毅夫到慈溪调研时，了解到慈溪许多制造企业“企二代”经常组团到美国的硅谷、波士顿等地考察，了解当地科研人员的研发成果，把适合国内市场并符合自己生产能力的项目带回慈溪，并实现产业化。

“同时，当地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建设人才公寓，配套教育、医疗、商超等生活设施，用来引人留人，使海外高层次人才留在宁波就业、创业。这种‘筑巢引凤’的经验非常好，我经常在全国各地推广‘宁波经验’。”

林毅夫表示，改革开放近40年，宁波经济年均增速为13.3%，比全国高3.7个百分点，成就蔚然。同时，宁波人均GDP已经达到1.8万美元，迈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。

“展望未来，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大背景下，我希望宁波能够秉持创新、协调、

绿色、开放、共享五大发展理念。”林毅夫说，“宁波在过去发展中，我觉得各个方面做得很好。如果从共享的角度来说，宁波本来有这方面的优势；绿色，青山绿水也是宁波的优势；协调，宁波各类制造业非常发达；创新，宁波作为‘中国制造2025’首个试点示范城市，只要抓住机遇创新，我相信宁波未来发展会比较好。”

对于当前热门的杭州和宁波唱响“双城记”话题，林毅夫说，“有竞争，也有合作。杭州服务业、互联网比较发达，而制造业是宁波的优势。因而，宁波当务之急是制造业怎样继续进行技术创新、转型升级，怎样发挥企业家、政府的作用。到最后，高收入经济体一定会利用每个人优势，经济则做大做强。我相信，宁波今后发展的机遇还是很强的，应抓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机遇，继续领航全国发展。”

记者 陈旭钦 乐晓立